

第一章 文明是人的自由秩序 和秩序自由

诚然，所有的理论只是我们为了研知世界方便起见的假说而已。但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和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我们肯定会对人类的认知范畴和行为过程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的东西和价值的言论是与历史时空和人类自身的进程密切相关的，时间序列和空间状态从来不是停留在一点上的，加之人类自身不可剔除的缺陷，所谓是否、对否，真善美、假恶丑，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结果是言论秩序必然成为一种逻辑：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力。

众多的论著将文明理解为一种社会进程中的较高级形态，是与野蛮相对立的概念；或者将其规定为语言和文字被逻辑化，被人们感觉、记忆、积累和客观化，通过传播形成知识体系，使人的生活和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都达到丰富和舒适。前一种看法是社会历史学说，后一种看法是文化意义上的文明

观。

作为对传统的反叛，社会历史学说力图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精英的历史还原给被权力和金钱同时剥蚀的广大民众。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演变中，推绎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史。显然这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是受了斯宾塞的哲学思想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的影响。社会科学界把生物进化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能解决有关社会行为的起源和发展等类似问题的思想，把一个社会当做一个发展的有机体的思想，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类推法，这种生物学上的类推法被许多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所接受。

在社会历史学家看来，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但直线的渐进的发展绝不会导致有价值的结果。一部文明史是冲突与暴力的历史，冲突与暴力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人们坚信每次流血将换取比上次流血更为赏心悦目的成果，英雄的战车不断地在尸骨上驰骋，国民赖以存在的财富必须通过暴力聚集以换取公平，一部分人以消灭另一部分人为快慰和正义。这一文明观，直接导致了廿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阶级斗争运动，对人类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简单化的社会哲学想把人类复杂的文明演进归纳为一种规律，这遭到了来自卡尔·

波普尔等人的强烈反对。亨廷顿不愿看到暴力，但却不愿放弃冲突，他高高举起了未来的世纪是冲突的世纪的旗帜。无疑这一文明观存在着不可回避的悖论。文明既与野蛮相对，也就与暴力无缘，文明本来并不具有冲突，冲突本身正是不文明的表现，以手段强行一种文明是对文明的反动，还是推动？

与这一理论相联系的是东西方有不少社会科学家和包括托夫勒在内的未来学家，以生产力为主线将人类文明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按照这一框架，人类因为劳动实践而进入工具制作革命，经农业革命到现代工业生产力引发的工业革命，其未来义无反顾地将通向这一康庄大道：即以现代工业、科技革命为推动力，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的变革。这一对人类近现代史、特别是西方社会的高度概括，把人类进步的终极指针投向了资本和工业。无疑这一理论给那些被殖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曙光，并被看作是救世良药。然而西方社会的现状使人们必须进入一种更深入的思考，资本和机器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是奴役还是文明？公正和自由注定是乌托邦的东西？难道人类的丰裕注定要以不公平、邪恶、掠夺为代价？

以上两种影响两个世纪人类的文明观，虽然因

为意识形态的缘故曾产生分歧、对峙和矛盾，但至少在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即：作为本质意义上的人类共生的自由，在不可遏制的历史和经济决定论面前是抽象的、苍白的。

按照文化文明观，人和人类社会都是以文化为标志的，既不存在没有文化的人，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从而得出所有的文明都来自文化——可能来自一种文化或几种邻近文化——并举出历史佐证：埃及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起来的。西方的一些学者并不把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别，这肯定不是完全出自概念上的混淆，很可能是出于他们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文明是文化的精华，从文化自身的价值上寻找文明的内容。泛文化主义思想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地方。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研究即是一例。他把文明看作是比国家大、比世界小的中间范围内的东西，从现存的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代，举出二十一种文明，就其发生、成长、衰退、解体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并对唯一持续了四千年的中国文明情有独钟。汤恩比构创了挑战与迎战、退引与复出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方法，建立了其博大的历史体系，但他始终没有深入研究文明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迎战机制及这一机制的深层原则。实际上，他把文明看作各种文化要素的堆

积物来处理，只要高兴，他就取出其中一部分来论述，而把其余的弃置一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盛行一时的中国文化大讨论，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相呼应，几乎把所有阻碍中国历史进步的邪恶、阻力、愚昧，都归原于文化问题，并试图以建立新文化而促成新文明。日本学者从文化体系角度建立物质与精神的幸福和舒适的方法，可能是更接近于探讨文明内核的一种方法，但促使幸福和舒适的内在力量及其程度恐怕远不是一般文化问题所能解决的。

地缘文明观和种族文明观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明观。

地缘文明观的重要人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曾提出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一些学者从这一思想出发将文明阐述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地中海文明、太平洋文明、印度洋文明，等等。将种族文明观推到顶峰的是二战期间的德国领袖希特勒，他以不可一世的权力认定：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看法造就了声势浩大的德意志公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潮流，成了他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和消灭犹太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文明一词在西方源于拉丁语 *civitas*，意思是“公民的”、“有组织的”、“城市的”。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周易》乾卦文中，里面有“天下文明”这

句话。据研究者论证，远在殷周社会，就用“文明”这个词来说明社会中的“美好事物”、“礼节”、“道德”、“行为”等等。在研究中，我们当然可以将东西方对文明的词义作为原始界说，然后引伸出我们必须回答的文明内核。

公民存在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导致了组织？组织的主体是什么？组织对于其主体究竟有什么意义？组织演化的方向是什么？

而城市赖以存在的法则究竟是什么？“美好事物”的根源是什么？

无疑，文明出自人类历史的结晶，是整个历史的中心主题，要对文明予以讨论，首先必须对以往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科学主义是最反对人文领域中的不精确性的，甚至认为除了数量化的经济学和生物学之外，其它学科都是废物。但是至今为止，我们发现，要给历史以结果，就必须以历史事实为证据，归纳仍然是其它方法所不可替代的有效方法，其次才能再做所谓逻辑的、数理的分析。

从古今到未来，在无限和有限的序列中，从寰宇的东西南北到中国、在无际和有际的空间状态中，从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到语言文字的所有记录、在人类行为表现的各种领域和环节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二维的大写：那就是人和自由，人类意志和

自由法则使时间、空间和人秩序化了。

我们今天已彻底抛弃了近代自然科学从哥白尼到牛顿形成的被组织的静态的宇宙观。现代宇宙学把我们带到一个演化的自组织的宇宙，从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化合物到生命直至人，一切存在物都是物质世界自组织演化的产物。

所谓自组织，亦即自行、自由组织起来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比利时科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中。自组织中的组织是指人类意志所感知的一切外在物（包括人）的存在和过程的组织。外在物作为存在，其组织是指按照一定结构和功能关系构成的方式；外在物作为过程，其组织是指朝着时间、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方向演化的过程。在外在物演化过程中，组织意味着外在物朝有序方向演化，而不是朝结构瓦解演化，当然组织作为演化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旧结构瓦解、新结构产生的情形。所以这里的结构指系统整体的结构，也是指演化前后关系中后继结构比先在结构更有序的状况。组织意味着组织性层次的变迁和复杂性的增长。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组织的存在和过程，而在于其作为存在和过程的根本力量，即自我、自由，也就是说，组织作为存在，它是自我和自由的结果。组织作为过程，它是自我和自由的必然。因此，把被组织（有外界特定干预）包括在组织里面是非常

错误的。组织是自组织的结果和开始，被组织只是其中的环节而已，根本不具有目的性。

形形色色的现代宇宙模型很多，诸如：原初原子模型、大爆炸宇宙模型、稳恒态宇宙模型，等等。尽管没有一种模型能对宇宙作出完满的解释，但是它们总体上都承认，我们观测到的宇宙是一个自组织、自发运动、发展演化的宇宙，尽管在具体的组织方式、运动方式、演化方式及其过程、阶段上，还存在着种种分歧。

人的出现是与宇宙的演化紧密相连的，人是宇宙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美国宇宙学家迪克曾根据物理学家狄拉克的大数假说，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论点：宇宙是人的宇宙，而人则是宇宙的人，两者统一于宇宙演化的现阶段。中国的道家曾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是阴阳交合而成，阴阳乃由浑沌未分的道所生，因此，人产生于道。与这种直觉主义的猜想所不同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生命的诞生，人的生成，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这些条件正是宇宙的自组织演化而成，人赖以产生的化学元素是自然界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恒星的一生自氢开始，逐步产生了一些其它元素，而众元素只是恒星临终时发生超行星爆发时才形成的，这种爆发把种种元素散射到太空之中。这些成分以特定的

方式，通过物质自组织而结合进地球，成为地球有机界诞生及生命和人诞生的基础。人生成所必需的环境方面，太阳系中的地球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和运动，使之有可能成为生命的摇篮，而物质的自组织以及生命的出现，又进一步改造了地球，使之产生了生命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地面环境。物质世界在自组织的演化中，终于在一定的时间内创造了生命出现的前提条件并在其更进一步的自组织中，在环境条件和内在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孕育成了生机盎然的有机界，直至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因此，如果说一些基本物理常数确实反映了人之出现的条件，规定了这种可能性，那么物质世界的自组织作为一种根本力量则利用了这些条件，实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人是物质自由组织的结果，也就是说人是一种自由组织体。

以上现代物理学的成果有助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机界是自由的结果，有机界是自由的结果，人也是自由的结果，自由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方式组织了大千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作为一种最本质的力量和内核贯穿于有机界、无机界和人的所有内在组织中。自由在这里是无限的意思。这种无限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生命中的内在要求和规定，正是这种无限制的东西——自由，促成

了人体的各种需求。

人类自由的必然要求是各种自由行为。行为的长期经验化促成了语言、制作工具、劳动，开始形成部落、家庭、群体、国家，而它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死亡，死亡是人类回归自然，要求自由的最终结果。人作为存在，他是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是自由到自由的中介。人类在追求死亡、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然要与人们为了自由而形成的秩序发生冲突反抗，这种冲突与反抗便构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全部，无限制的自由也就上升到了社会历史意义的自由。人类从自然法律的藩篱中解脱之后，直接面对的又是社会法律；解除了动物对人的威胁，又产生了人对人的威胁，战争、祭祀、甚至食人肉；人类刚刚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却又以层层枷锁——家庭、家族、部落、社会、国家把它束缚起来；人褪了皮毛，却又披上了遮掩的衣物；人造就了房屋院落，却又加了锁。历次农民战争的改朝换代，历次世界大战的版图疆域重新瓜分，资源的无际掠夺，资本的累积，工业的开发，信息的传递，权力的更迭，都是各种各样的人类自由意识在起作用，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观便与人生存意义上的自由观产生了无法避免的矛盾，构成了庞大的社会历史画面，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是社会自由观向生命自由观的靠近。社会是与人类共存亡的，因此只有死亡即

个体的死亡，类的死亡，人类才能获得生命意义上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思想巨匠卢梭曾悲壮地道出千古绝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因此，我们阐述的文明观，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文明观，也就是人类产生了语言思想国家以后的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的总和。文明意味着人类不断地追求自由、获得自由、走向死亡的过程。国家、群体、文化、资本、权力、河流山川、道路城市、工业农业等等秩序的现象只是这一过程的必需的外在形式和利用物、对立物。

因此，我们将文明确立为人的自由秩序和秩序自由。换言之，文明是人、自由、秩序的总和。自由是人和秩序赖以存在的根本力量和原则，秩序因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秩序是全部自由的环节，而绝不是自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对各种秩序进行加工、复制、改造、摧毁、重铸而追求自由的历史。

以上概括就是我们对前面关于文明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的根本回答。

第二章 自由与秩序的相互作用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

要把握现阶段文明的进程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就必须对人类文明史进行阶段性的考察和研究。

第一节 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文明时代

与那种将国家看成是文明的标志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从人产生、特别是语言文字产生后一直到国家产生前，人类已进入文明时代。这一时期人类文明主要表现在对自然及神的反抗和统一上，人类在不自觉地建立自由秩序。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家庭、家族、部落、阶层、社会程序，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人的行动自由的根源来自于人脑是具有高度发达的自组功能之特性。人类心理活动是由神经活动决定的，神经活动的主体是人本身，大脑神经活动过程所决定的东西也就是人自己决定的东西。因此，

身心俱全的人就有着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人类的生活行为不论内心的决策活动有多么严格的神经机制，对人自身来说都是其内部活动，属于人生命内在规定的要求。人类正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情绪、兴趣、爱好、意愿、信仰等身心因素来选择自己的目的、决定自己的行为。人类的这种自由正是人身体和大脑内部自组织活动的自由。人类的内心世界不是一个随机事件的万花筒，而是具有连续性、规律性的。人可受自己意志支配，使自己的行为具有目的性，进而人类就有权力和能力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改造、加工，使之按人的目的性而进行。外在程序的存在是人类追求内在自由的对立物，人类每前进一步，人类的内在自由的要求就与外在秩序发生更深的冲突，这种冲突愈深，人类对内在的自由追求就更广泛更激烈。人类必须通过人类意志将人类的内在自由渗透到程序中，以使外在程序更接近人类内在自由的要求。

原始人首先面对的是自然。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的自由与秩序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外在自然现象：地震、洪水、禽兽、气候、山川等的敬畏和反抗上。作为有机界的进化物，原始人类确信外界物与人类具有同等的意念和思维，人的意念还原到物的身上，上升为万物有灵意识。人类对自然神秘物的不可理解的畏惧意识，试图将内在对自由的要

求转化为外在对自由的庇护上，而产生了神话，进而形成了宗教，人类的文化文明开始形成。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食物的自由需要，必然由单个人优化为群体人，经验使人类相信合力的力量对自由的保障，家庭、部落、阶层、公社便成为必然，社会文明开始形成。

这样，人类再也不是简单地仅与自然构成一幅图景了，人类造就了人类的另一个对立物——神秘主义：神话、宗教、艺术和家族、公社、社会。它们作为自由的结果，而成了自由的障碍。人类正是在这些方面，在自由与秩序冲突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它的最初文明。

这一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国家产生前黄河流域的中国、恒河流域的印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地中海的希腊、以玛雅社会和印地安人代表的美洲等。人类作为意识主体区别于其外在物的标志是思维和劳作，由此所产生的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的分析来看，人类思维与语言，不仅是自组织的，也是同时出现的，人的语言与动物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它是一种自然和社会的复合现象，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形成，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声音信号，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人类的语言是表现思维的，是自主的、语义的，没有内含的“语

言”只是一种自然声音，因此语言更是一种人的精神自由的现象。世界上最早的语言文字始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原始文明的研究除了依靠考古挖掘以外，主要是借助文字材料，以此验证。早期人类的神话和宗教创造，从艺术的角度看，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但从原始人的思维上看，却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思维活动，它所表现的智慧价值和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说明了人类在这个阶段的文明程度。原始人将人之外在物都看作是生命和欲望的作用的结果，山川、河流、草木、日月、星辰，都是有灵性的生命体，神话将外在物形象化、拟人化，赋予外在物以生命、意识、超自然的力量。世界各地的古人都创造了许多相似的日月神话、洪水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英雄神话等，神话与宗教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文明观，这说明人类在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时代对自由与秩序冲突而形成的思想是一致的。神话的天真烂漫和自由想象，滋养了各种艺术的产生，宗教以庄严仪式为特征，它成了社会秩序的象征。在创世神话中，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天地浑沌如鸡子”，埃及的神话中神也生于“天地尚未分开之时”，玻利尼西亚人的创世神话（长者纳拉乌）中“纳拉乌”也是“浑沌”之一。人类在这个时候对世界起源进行

思考时，并不认为世界是人及其自由的结果，而是一种神——人类自由意志的不明物。人在不断地思考着一切，但人对人的认识并不充分和具体。在人类起源神话中，巴比伦神话中认为，人是从“洪荒时代的泥土中创造出来的”，希腊神话中也认为人是泥土的产物，中国古人则认为“女娲抟黄土做人”，这说明人是自然之子、大地之子，人在生存上并不具有什么更优越之处，同是天地自由交合的结果。人类在这里并没有将人及其自由从外在物中分离出来，而是朦胧同一的。中国八卦中的乾坤两卦，既象征天地又象征男女及其生殖器，把人类最具魅力和色彩的地方等同于天地，每一个人的生殖器上充有天地之力量，多么伟大的自由意志！太阳带来的炎热干旱使人类一直想控制它，便寄希望于后羿射日上，正是太阳使人类开始真正地正视自己。古希腊神话的赫拉克勒斯、忒修斯和普罗米修斯，巴比伦神话中的吉尔加美什，中国的大禹等，皆人类英雄，英雄神话所反映的已不再是外在物、特别是自然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制约，而是人支配、控制自然力使之成为人类服务的想象。人类从对自然的敬畏，到企图与自然的同一，再到人类对自然的反抗，人类开始从人自身中寻找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力量，从自然神到人化神，这是人类自由的外在发展。原始人类对神抱有浓厚的感情，神是人类理想、自由的

对象化，原始人不但把崇拜变成了迷信，而且试图以自己的情绪去感染神明。原始人是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神，利用活人的自由精神影响神，然后把自己的自由精神赋予神，让神作为自由精神的代理。人类将人的自由力量和意志力量全部寄托在英雄身上，这是现实人的神话，是对全能人的要求，对领袖智慧的崇尚，一种专制秩序已在人类心灵深处成为雏形，人类已不满足于生命自由作为内在的要求，面对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人类需要秩序，需要以英雄为中心的秩序，并企图通过这种秩序寻求单个人面对外在物所不可能获得的自由和要求。

神话中的神与人是较为一致的，众神之王的宙斯其品性被描述为有好有坏有优有弱，但宗教中秩序化的英雄却是神圣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它并不象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无限的人类意志力量的伸展，而是将人类自由意志程序化、秩序化，在等级中建立权威，在权威之下寻找自由。宗教使人类从海市蜃楼的天空掉在了坚实的大地上，宗教的出现是原始人确立自我和自由意志强化的结果，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中所使用的工具。

原始人对自由的要求是建立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基础之上的，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形成了宗教。宗教通过它的仪式、程序将神话中的英雄